

生态环境问题根源辨析

李 祥

(北京师范大学法政所,北京 100875)

摘 要: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当前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文章针对问题的根源进行辨析,提出认识的局限性、对先进技术的滥用和人类私欲的膨胀使环境问题产生并不断恶化。最后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与对策。

关键词:生态环境;人类中心论;科学技术;私欲;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80(2003)04-0015-04

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化和人类活动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环境问题已从社会生活问题的边缘走向中心,生态问题越来越凸显出来。对这一问题的反思与进一步认识,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协调发展,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将有极大的帮助。

生态环境问题由人类肇始,既包括主观的认识根源,又包括客观的实践根源。

第一、认识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起初人类的力量十分有限,人类的命运掌握在自然手中。“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1]“那时的自然不是人类的平静、和谐的伙伴,而是庞大的、严厉的、危险的对立面;它不是人类的朋友,它是狂暴的,是人的敌人。”^[2]“初民”像牲畜一样“被自然界的“无限威力和不可制服的力量所吓倒”。在强大的自然界面前,人类只能是“洗耳恭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人们对自然采取顺从的态度,以便能够更好地适应自然,从自然获取人类必须的生活资料。人类这种委曲求全的生活方式是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反映。

经过工业革命洗礼的资本主义,生产力获得迅速的发展,科技获得长足的进步,自然科学门类纷纷建立并喜获丰收,人类对自然奥秘的探索一路凯歌,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到足以令人骄傲自豪的程度。同以往社会相比,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出现了强烈的反差,角色出现巨大转折。科技的力量使人类在自然界面前终于昂起征服者高贵的头颅,大自然不再被视为神秘莫测、难以捉摸的崇拜对象。人类提出“向自

然进军”和“为自然立法”等口号,认为人是世界万物的目的和中心,人是主体性的存在,万物依我而存在,自然理应成为服务于人类的仆人,是人类可以认识和改造的客体,形成人与自然主客二元对立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是线性的、单向式的关系,只存在自然客体对主体需求的满足,不存在主体对客体的尊重与保护,即人类只是权利主体,而非义务主体,自然则反之。这种世界观没有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出全面的认识,只看到社会与自然的区别,未看到二者的联系,把人与自然置于绝对对立的两极。

在这样的世界观和认识论指导下,人们对自然不再采取尊重与敬畏的态度,由自然的宠儿和朋友变成自然的对立面和敌人,由顺从者变为改造者和征服者,对自然采取对立、对抗的态度,“地球似乎成了人类进行巨大的自我竞技的舞台”。^[3]人类在自然界面前为所欲为,大行改造之能事。只知索取,不知回报;只顾近期效果,不顾远期效果;只顾经济利益,不顾生态和社会效益。不仅对现在的自然过度开发、开采,还肆无忌惮地透支未来的自然。结果是:可再生资源的消耗率超过了自然的可再生能力,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速度超过了寻求作为代用品的可更新资源的速度,环境的污染程度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不可逆的环境退化程度超过了建设新环境的速度,从而严重扰乱和破坏了整个地球生命的自然支持系统。这种剧烈“透支”的积累效果终于打破了自然的平衡。自然在貌似强大的人类面前变得遍体鳞伤,千疮百孔。自然资源不断耗竭,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上千万年甚至上亿年的非再生资源,仅仅在过去二百年间就被用尽或毁掉了至少一半。自然对人类的支撑能力越来越弱,最终导致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森林面积逐渐减小,沙漠化程度越来越

【收稿日期】 2002-12-25

【作者简介】 李 祥(1972-),男,安徽来安人。南京审计学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经济哲学和社会发展哲学研究。

严重,空气质量不断下降,水污染程度愈益严重,人居环境不断恶化等。对此,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恩格斯就曾告诫人类:“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它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4]

正是人类的无知、短视和急功近利,给原本“完整、稳定和美丽”的大自然以极大的破坏。事实上,社会和自然具有同源性,人和人类社会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与动物的揖别,并不意味着人与自然界的彻底分离,人仍然要生活在自然界之中,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所以人类社会要生存、发展下去,前提是认识自然、尊重自然并保护好自然。人类破坏生态平衡,浪费自然资源,无异于慢性自杀。

第二、对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的滥用。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是中性的、中立的。一方面,科学技术是人们可以运用的一种工具,凭借科技求生存是人类的天命。它能给我们带来物质的充裕和满足,并且科技越发达,人类的生存问题就可能解决得越好。另一方面,对科技的不当使用又可以产生一系列不可预见的灾难性后果,使人们在追求物质富裕的同时,成为物质的俘虏,在追求理想家园的同时,又在不断远离并丧失自己的家园。

科学技术作为人与自然关系实际展开的中介环节,是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能力的重大体现,人类正是借助科技的力量,把广阔的自在世界开辟为属人的世界,打上人类活动的烙印。在科学技术的强大攻势下,在自然被“人化”的过程中,生态环境的稳定遭到了越来越严重的破坏。科技进步和环境恶化之间的因果关系愈益明显,并为众人接受和默认。

科技由人类发明和使用,其结果的损益也由人类承担。科技可以为抱有不同目的的人服务,它的运用既可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也可能产生不良后果。这是因为科学技术的使用要受到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影响和控制,要受到当时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性质的影响和控制,要受到人们的主观意图和目的的影响和控制。再先进的科学技术,如若被滥用,只能导致环境状况的破坏与恶化。

今天我们面临的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正是人类借助科技力量造成的。机械的使用加快树木的砍伐,导致森林面积锐减,水土流失严重,沙尘暴频频作威;先进采掘工具的使用,使过度开采自然矿产资源成为可能,肆无忌惮地挪占原本属于子孙的财富,加速资源耗竭;化学的运用,释放出越来越多的 SO_2 、 CO_2 等有毒有害气体,导致全球气候变暖,极地冰雪融化,大气污染严重,酸雨与人类相伴;先进的交通工具和捕杀工具的使用,使人们能够大胆地涉足野生动物栖息地、深海区域和极地地区,提高自己的捕杀效率,导致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等等。

美国人文主义物理学家卡普拉从生态环境的角度完全否定科学技术。他认为“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就是科学技术严重地打乱了,甚至可以说正在毁灭我们赖以存在的生态系统。”^[5]虽然观点有点绝对,但他告诉我们科学技术对当今人

类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破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美国学者拉兹洛也曾指出,过去二三百年的技术有相当一部分不是给人类造福,而是给人类造祸,因为它们消耗太多的能量和物质,造成的环境损害太严重,并认为有必要寻找和采用新科学和新技术。^[6]

所以,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方面,“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7]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在发展资本主义相当短的时期内,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污染和破坏比过去一切世代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污染和破坏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自然主义者,主张抑制科技的进步,而成为反科学主义者。问题在于人们应如何认识和利用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人类体力和智力的延长和拓展,既可以服务于人类的长远、根本利益,增加人类福祉;又可以被少数人操作和利用,谋取局部的、眼前的经济利益。把科技当作谋求超自然的人文成果或非人化的人文化工具实则应以抛弃,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要受其价值理性的制约。

第三、人类私欲的不断膨胀。在人类发展的早期,囿于有限的认识和低下的生产能力,人们不敢奢谈欲望。后来生产发展了,产品在满足人类直接的生存需要以后,尚有剩余。于是,各种各样非生存性需要发展起来了。这些需要的满足,如若超过一定限度,而被推崇至极,便适得其反,成为有害的了。但人类不是十全十美的存在物,人类没有勇气在需要和欲望之间设置一道鸿沟,而是在基本需要满足的基础上,进一步盲目追求无止境的欲望。

目前人类面临的资源和环境问题主要是价值选择和受利益驱动。由于不合理的价值定位,使一部分人极力追求物质财富和奢华的生活,追寻今生的醉生梦死,纵欲无度,从而导致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受利益驱动,使一些发达国家或垄断集团不择手段,谋取暴利,采用“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并且把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奉行“垃圾殖民主义”,但又拒不承担应负的责任。

众所周知,今天如此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是发达国家在其长达200年的工业化过程中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大量排放污染物和高消费造成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市场经济,每位生产者的目标都被锁定为利润最大化。资本家生产目的不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而是要服从资本价值增殖这一最高原则。在生产领域,资本家只能拼命扩大生产规模,无节制地向自然索取,视自然为专供自己无偿使用的、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资源库。但自然由此得到的却是污水和浓烟。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的单一目的时指出:“劳动本身,不仅在目前的条件下,而且一般只要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它就是有害的、造孽的。”^[8]

时至今日,一方面,发达国家不论是从总量还是从人均水平来衡量,其资源的消费量和污染物的排放量仍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只占世界人口1/4的工业化国家长期消耗着世界3/4以上的自然资源,而占世界80%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仅享用20%的社会服务。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源控制和掠夺的同时,为了保持高水平消费和经济稳定,至今仍需依赖发展中国家。如原料方面,美国虽拥有

世界矿物原料总储量的 44% ,但其工业消费的 95 种主要原料中,有 68 种需要从发展中国家进口。西欧和日本原料的 1/4 和 2/5 也要从第三世界进口;能源方面,美国 40% 的石油靠进口,日本、德国、法国的石油 90% 依赖进口;市场方面,美国出口总量的 40%、日本的 1/2 是输往发展中国家的。

美国是高消费生活方式的典型,崇尚浪费性消费、奢侈性消费、炫耀性消费的消费主义价值观。美国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 5% ,却消耗世界 25% 的能源。美国人均消费的粮食、煤炭和石油是非洲居民的 8 倍、500 倍和 1000 倍。^[9]德国作者弗里茨·福尔霍尔茨在他的《享乐主义者造成负担》一文中指出:一个预期寿命为 80 岁的普通美国人,在目前的生活水平下,一生要消费约两亿升水、2000 万升汽油、1 万吨钢材和 1000 棵大树。如果地球上所有人都像美国人这样生活,按照美国的消费水平消耗能源和资源,并相应排放有害物质,我们需要 20 个地球。^[10]这种生活方式与环境保护格格不入。

在消费领域,人被欲望所驱使和统治,成为欲望的奴仆。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哲学家蒙田呼吁到,人应该在今生今世的生活之中尽情享受,一个正确而真正地享受自己生存之乐的人,是绝对的并且几乎是神圣的完美的人。消费成为满足欲望、获得认同、取得社会资格的唯一手段。美国一位社会学家指出:“在过去,满足违禁的欲望令人产生一种负罪感,在今天,如果未能得到欢乐,就会降低人们的自尊心。”满足欲望成为社会的信条,衡量人的尊严不再以德性为准则;人的价值不再以贡献为尺度;人生的目的不再是追求超越现实的理想。人们只知道拼命赚钱,及时消费,尽情享受“凡人的幸福”。人类的信仰失去往日神圣的光环,并与欲望握手言欢,形成马克思所批判的“商品拜物教”和“金钱拜物教”。

二

自然环境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大自然生育并抚育了人类,大自然是人类之母,是人类生命之源。人类只能信赖自然,而不能脱离自然,只能认识和适度利用自然,而不能征服和破坏自然。为了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维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做到:

(1) 消灭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 生态环境危机,从表面上看是自然危机,是由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引发的。但其实质是人性危机,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造成的,是人们的经济利益冲突在自然领域的折射和反映。“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11]所以,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首先协调人与人的关系。“要实行这种调节,单是依靠认识所不能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12]

私有制是劳动异化和由劳动异化而造成的自然现象异化的根源。但仅仅批判劳动异化和自然的异化,“发泄高尚的义愤”是无济于事的,无法从根本上超越社会发展价值向度的偏离和社会发展创造的物质财富的奴役,无法遏制住主体效应和非主体效应的严重冲突。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进行制度的变革,即以共产主义取代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才能拨正社会发展的价值向度,最终消灭各种异化现象。

“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抗争。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它知道它就是这种解答。”^[13]

(2) 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树立可持续发展思想 传统的生产方式以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低效率为基本特征,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投资规模的扩大,社会消费崇尚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只注重索取和行乐,不注意奉献和保护。这种存在方式极大地干预和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超过了自然的可承载能力。为了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应清洁生产,绿色消费,改造自然与保护自然相结合,并且利用自然要以保护可利用自然为前提。即由传统的冲突占有型向共生和谐型生存方式转变。

在思维方式上,应认清人与自然之间不存在谁决定谁的关系问题,二者是双向建构关系。一方面,人是自然的产物,自然是人类物质财富的提供者,自然是人类的无机身体。另一方面,人是自然界演化发展的最高产物,有认识、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能力。人不能失去自然,自然若离开人也无意义。保护自然和维护自我存在是一而不是二,应该树立“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存在观与发展观。即由传统的功利型思维向互利型思维方式转变。

要有整体性思维。环境污染、生态危机是全球性的,没有地理国界的限制,这是一个被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我国的沙尘暴漂洋过海“出口”到韩日,伊拉克海湾战争,因油井燃烧而释放出大量的 SO₂ 形成的酸雨已使许多国家受其害即是明证。德国前总理勃兰特领导的“全球政治管理委员会”就曾指出,现在世界各国的利益是相互依存的,南方国家离不开北方国家,北方也离不开南方。我们大家坐在同一条船上,如果南方的一端在下沉,北方是不能无动于衷的。^[14]即由传统的分析主义思维方式向整体主义思维方式转变。

(3) 践行真正的“人类中心论”思想 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自然发展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与人类实践活动的合目的的无目的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解决必须高扬人的主体能动性。如果说“人是万物的尺度”、“知识就是力量”等是从肯定方面说明人的主体性的宣扬,那么生态危机、环境问题就是从否定方面说明应该对人的主体性进行调整。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引导人的这种能动性,使之趋于健康、理性,从而探索和创造出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的有效结合。

真正意义的人类中心论是以全人类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5]但目前,要使“人类中心论”思想得以真正实践,还存在一定的困难,这主要是因为真正的“类”主体还未形成,即主体缺位导致的。它的实现只有靠每一位地球村民的一致行动,形成全人类的“合力”。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对地球的种种极不文明、极其粗暴的举动往往视而不见,甚或被戴上发展经济、为人类谋福利的美名而大加赞誉,丝毫未感觉到这是对人类和子孙后代的犯罪。

所以,我们的发展应从不顾他国人民生存需要的发展模式,转向既满足本国人民又满足他国人民生存需要的发展模式;从不顾子孙后代生存需要的发展模式,转向既满足当代人又满足后代人生存需要的发展模式;从维护部分人的眼前经济利益,转向维护人类的长远、根本利益。为此,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现代人既不要像古代人那样做自然的奴隶,也不要像工业革命以来那样做自然的敌人,而应与自然和谐相处,同自然建立兄弟朋友般的关系,彼此尊重,相互依存,共生共融,协调发展。

(4)诉诸道德力量的支持 生态困境由科技引起,但我们不能把困境的解脱仅仅寄希望于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不能乐观地认为科技发展了,环境问题自然而然会得到解决。因为,如前所述,科技是中立物,它的使用要受到人们世界观、价值观的影响和控制,与当时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的性质密切相关,同时,人们的主观意图和目的也会左右科技的使用。所以对于困境的摆脱,除了求助于科技的发展外,还应求助于人类理性和道德力量作保证。仅凭科技进步和市场调节不可能有效地保护全球的生态环境。唯独人类能重新认识到精神价值的极端重要性时,才不会把追求无限的力量完全倾注在物质领域,才能使全球性的生态灾难得以缓解。

美国学者威利斯·哈曼博士指出:“我们唯一最严重的危机主要是工业社会意义上的危机。我们在解决‘如何’一类的问题方面相当成功”,“但与此同时,我们对‘为什么’这种具有价值含义的问题,越来越变得糊涂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谁也不明白什么是值得做的。我们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16]传统社会发展理论仅被看成是研究“怎么样发展得更快”的规律的“科学”,而丧失了哲学反思、价值评价的功能,失去了伦理约束和规范功能。巴西世界人类环境会议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指出:“现在世界大家庭面临的我们在环境问题上造成的后果,给我们共同安全造成的危险要大于传统的相互之间军事冲突带来的危险。道德伦理和精神方面的价值是人民和国家产生动力的最终的基础,我们应当加以利用,并表现在创立新的‘地球道德’,从而激励人民共同加入包括南方、北方、东方和西方在内的新的全球伙伴关系,确保地球的一体性,使之成为我们这一代和后代子孙的安全、平等和温馨的家。”^[17]

(5)控制人口数量,缩小贫富差距 控制人口数量。人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体,人既是使用价值的创造者,又是污染的肇事者。人类在生产、生活中必然要产生出各种废物,这些废物如若不加限制和处理就排放到环境中,必将造成污染。同时,人口增长太快同生产、生活资料的增长不相适应。人类社会初期,由于个体力量的限制,加之自然的恶劣环境,自然形成“多子多福”的人口观念,即人口的多寡与族群的兴旺发达休戚相关。而在科技十分发达的今天,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类医疗状况的极大改善,决定人类命运的不再是人口的数量,关键在高素质的人口。人口数量的极大膨胀不仅不会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反而会成为经济社会前进和发展的障碍。

缩小贫富差距。当今世界也许是地球生命史上贫富地域差距及人均收入差距最大的时期。富人用来喂养宠物的食物,比穷人用来哺育后代的食物的质量要好得多。对于饥

饿的人来说,食品总是优于清新的空气。在一个不平等和贫困的社会里,无法避免人们对大自然的掠夺,无法根除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源。

(6)发展知识经济,调整产业结构 发展知识经济。由于知识和信息具有非消耗性、非稀缺性、非竞争性和可再生性、可分享性和无限增值性等特征,可以降低自然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利于社会走出因各种自然物质的稀缺和枯竭的困境,为消解和超越传统经济由于资源的短缺而引致的竞争提供了可能。并且知识的生产几乎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可达到比工业社会减少污染之目的。

调整产业结构。必须深化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继续加强第一产业的基础地位,着力调整和优化第二产业构成,降低第二产业在经济中的过高比重,解决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行业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通过技术进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改变以前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状况,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此外,要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信息产业),大力推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总之,生态环境的治理与保护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系统的、紧迫的、基础性工程,它不仅关涉到人类的生活质量,更主要的是关涉到人类是否有理由继续生活在这颗星球上。我们责无旁贷地把一个山川秀美的家园传给子孙。

【参 考 文 献】

- [1][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35、35.
- [2][德]萨克塞.生态哲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1.
- [3]威谦·莱斯.自然的控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140.
- [4][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384、385.
- [5][美]弗·卡普拉.转折点: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16.
- [6]参见[美]拉兹洛.系统哲学讲演集[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271.
-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7.
- [8][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5、120.
- [9]参见魏建文.美国与全球可持续发展[J].广西社会科学.2002(1):44.
- [10][德]弗里茨·福尔霍尔茨.享乐主义者造成负担[N].时代周报.1994-07-22.
- [14]参见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报告.北方和南方:一个争取生存的纲领[R].1980.
-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26.
- [16][美]威利斯·哈曼.未来启示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193.
- [17]王 伟.生存与发展—地球伦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5. (责任编辑 郭晋风)